

志愿填报热背后：公共指导服务不能缺位

■张端鸿

每年6月高考落幕,上千万考生走出考场后,很快将面临另一场更为复杂的“大考”——志愿填报。与高考相比,志愿填报看似是一次技术性操作,实质上却关乎个体发展机会、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国家人才结构优化。它既不是单纯的家庭私事,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市场消费,而是带有明显公共属性的教育决策环节。当前值得关注的重点在于,志愿填报的市场化供给异常繁荣,而面向考生和家长的公共指导服务仍显不足。

这种供给结构不仅没有有效缓解家庭焦虑,反而可能把信息差距进一步转化为选择差距,甚至形成新的教育不公平。

不够完善的公共指导体系

近年来,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数千元、上万元的咨询服务并不鲜见,互联网平台和各类机构也纷纷推出人工智能(AI)志愿填报工具、专业测评系统和升学规划产品。从需求端看,这种市场繁荣并不难理解。新高考改革之后,院校、专业、选科、位次、城市、就业、升学等因素高度叠加,志愿填报的复杂程度明显提高;而从高考出分到志愿提交,考生家庭往往只有很短的决策窗口。时间紧、信息多、风险高,再叠加“一分一段”“院校专业组”“冲稳保”等规则,普通家庭很容易在短时间里陷入焦虑。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志愿填报本身并不是一项高深到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完成的神秘工作。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它需要的并不是所谓“内部消息”,也不是玄学式的“精准预测”,而是基本规则理解、专业信息筛选、风险区间判断和个人发展匹配。换言之,志愿填报的核心难点并不在于分析技术本身有多么复杂,而在于许多考生和家长缺乏系统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决策框架。当公共指导服务没有把这些能力建设在前面,家庭就容易在关键时刻转向市场,把本可以通过公共服务、学校指导和自我学习解决的问题,高价外包给商业机构。

因此,志愿填报市场的火热并不完全意味着市场服务能力有多强,也反映出公共指导体系还不够完善。

现有公共供给并非没有数据。各省份考试院会公布招生计划、历年分数、一分一段表,许多高校也会发布招生章程和专业介绍。问题在于,数据公开不等于能力形成,信息发布不等于有效指导。对很多家庭来说,真正困难的不是查数据,而是理解数据;不是不知道有哪些专业,而是不知道不同专业之间的真实差异;不是不知道某个学校往年多少分录取,而是不知道自己的兴趣、能力、位次和未来发展路径应当如何匹配。

这恰恰是公共指导服务需要发力的地方。政府和学校并不需要,也不应当替考生家庭作出具体选择。政府从来也没有直接判断“某个考生应该报哪个专业”,这也不是公共部门应承担的角色。真正需要补强的是公共服务



图片来源:摄图网

的解释功能、指导功能和能力建设功能。公共部门应当做的是把规则讲清楚,把数据做规范,把风险说透彻,把工具建设好;学校和专业机构应当做的是帮助学生理解自我、理解专业、理解大学、理解职业世界。最终的选择仍然属于考生和家庭,但他们应当是在相对充分的信息和较强的判断能力基础上作出选择,而不是在焦虑、传言和营销话术中仓促决策。

从这个角度看,当前公共供给的主要短板,不是“不替家庭作判断”,而是没有充分帮助家庭形成判断能力。比如,面对智能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软件工程等专业,许多家长很难分辨其课程结构、学科基础、培养方向和就业路径差异;面对同一专业在不同高校的设置,也很难理解研究型大学、行业特色高校、地方高校之间的培养目标差别;面对“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的社会讨论,更容易把短期就业热度误认为长期发展确定性。这些问题不需要行政部门给出唯一答案,却需要公共服务平台、学校生涯教育和专业化指导服务提供清晰解释。

尤其要警惕的是,当公共指导不足时,市场很容易把普通的信息服务包装成高门槛、高价格、高焦虑的产品。一些机构用“保录取”“不浪费一分”“内部数据”“精准预测”等话术吸引家长,本质上是在利用家庭的不确定感做文章。实际上,志愿填报没有绝对最优解,只有在一定规则、一定风险和一定条件下下的相对合理方案。把志愿填报神秘化、垄断化、焦虑化,既放大了市场利润,也弱化了考生家庭自

身的主体性。更重要的是,当咨询服务高度依赖支付能力时,信息支持就可能从公共性资源变成阶层化资源,进一步扩大不同家庭之间的选择差距。

AI志愿填报工具的出现也需要放在这个框架中理解。AI工具可以提高数据整理、位次匹配和方案生成的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信息查询成本,但它不能替代考生对兴趣、专业内容和未来生活方式的理解。不同工具给同一考生的建议可能存在差异,说明算法模型本身也有数据来源、参数设定和推荐逻辑的局限。如果家长和考生缺乏基本的数字素养和判断能力,AI工具不仅不会消除焦虑,反而可能制造新的依赖。技术越发展,越需要公共体系提升用户能力,而不是让家庭把复杂选择完全交给算法。

志愿填报供给体系需要多元化

优化志愿填报供给体系的关键不是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作简单二分,而是要形成“公共指导为基础、学校服务为主体、专业机构为支撑、市场服务为补充”的多元供给格局。

这一格局中,公共部门应当提供规则清晰、数据规范、平台便利、风险透明的基础服务;高中应当把生涯教育、专业认知和大学理解前置到日常教育过程中;高校应当更负责地公开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毕业去向和人才培养特色;教育评估机构、行业协会、学术组织和公共智库可以提供相对中立的专家解读;市场机构则可以在此基础上提供个性化、精细化的增值服务。只有这样,市场才不会被迫承

担过多准公共职能,也不至于在缺乏约束的状态下过度扩张。

这里尤其要强调高中阶段生涯教育的重要性。许多家庭在填报志愿时之所以高度焦虑,并不是因为最后几天没有找到“专家”,而是因为此前几年没有形成基本的专业认知和发展意识。如果学生长期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也不了解大学专业与职业世界的关系,那么再精细的志愿填报方案也只是最后时刻的技术补救。真正有效的志愿填报,应当建立在高中阶段持续性的生涯教育、专业体验、大学认知和职业启蒙基础之上。把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到出分后几天,本身就是教育指导体系滞后的表现。

同时,还应建立更加完善的信息回流机制。高校毕业生去向、专业学习体验、升学质量、用人单位评价,以及行业发展趋势等,这些信息都应当以适当方式在招生和志愿填报环节反馈。当然,这些数据不能简单化为“就业率排名”或“薪酬排名”,否则又会诱导功利化选择。更合理的做法是分类呈现不同专业、不同学校、不同发展路径的基本特征,让考生和家长理解各种选择背后的机会结构、风险结构和成长逻辑。公共信息越充分,家庭判断越理性,市场营销的操控空间就越小。

归根到底,志愿填报的市场化供给并非没有价值。对于一些有特殊需求的家庭,市场机构可以提供更细致的个性化服务;对于信息处理能力较弱、时间精力有限的家庭,适度购买专业服务也有其合理性。问题在于,市场应当是辅助性的,而不是替代性的;应当是补充性的,而不是垄断性的;应当建立在公共服务充分供给基础上,而不是依靠公共服务不足来制造焦虑、放大信息差、收割不安感。一个健康的志愿填报生态,不应是谁花钱谁更有把握,而应是每个家庭都具备基本判断能力,有特殊需要者再选择市场服务。

因此,志愿填报改革的方向,不是取消市场,也不是让政府直接下场替家庭作判断,而是要真正建立公共指导服务体系。要提高家长和考生的信息理解能力,完善高中生生涯教育,加强高校专业信息公开,建设更好用的公共服务平台,培育中立、专业的第三方指导力量,并对商业咨询市场进行必要规范。只有当公共服务托住底线、学校指导形成常态、专业组织提供支撑、市场服务回归辅助,志愿填报才能从一门焦虑生意回到教育选择本身。

志愿填报不是玄学,也不应成为少数家庭才能购买的昂贵服务。它应当是一项建立在公共信息、学校指导和家庭理性判断基础上的教育决策。真正公平的志愿填报,不是让所有考生作出相同选择,而是让不同背景的考生都能够在不支付高昂费用的前提下,具备作出合理选择的基本能力。高考改变命运,不只发生在考场之内,也发生在高考之后。公共指导服务不能在这个关键环节缺位。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数智时代

如何优化毕业证学位证设计

■王一涛 张晓燕

正值毕业季,毕业(学位)证是证明个人学历的法定凭证,也是人才招聘的重要依据。当前,毕业生求职升学往往需提交包括毕业(学位)证书、学籍备案、成绩单在内的多项佐证材料,用人单位亦需花费不少人力进行核验。即便如此,社会上学历学位造假现象依然屡见不鲜。例如,2025年11月被曝光的江苏科技大学材料与工程学院郭某的学历造假事件,原因就在于对其学历、履历等未进行实质性核查。

在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如何简化毕业(学位)证验证程序,优化防伪设计,精准适配求职升学需求,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当下高校毕业(学位)证书的主要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领域尚未建立系统的学位制度,高校只颁发毕业证书。彼时,证书除个人和学校基本信息外,背面多附带学业成绩信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建立了以学术能力评价为核心的学位制度,高等教育进入了学历学位“双证并存”阶段,毕业(学位)证书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统一制定证书格式,以规范证书使用、防止滥发和伪造。2000年后,教育部开始建立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制度,2015年印发《学位证书和学位授予信息管理办法》,将学历学位证书设计与印制权下放至各授予单位,不再使用国家统一格式。尽管高校在毕业(学位)证样式设计上拥有一定自主权,但都指向学校及学生个人的基本信息,对于学生综合素质及学业成绩等再无体现。

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现行毕业(学位)证书的信息承载量已无法满足人才评价的精细化需求。从毕业证书来看,仅能呈现毕业生姓名、性别、专业、毕业院校等基本信息,对于反映学习质量的核心指标,如课程平均绩点、核心课程成绩、所获荣誉等关键内容均未体现,导致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只能通过证书确认毕业生“是否毕业”,无法快速判断其学习、专业能力,还需依赖后续简历筛选等环节补充信息,大幅增加了招聘的时间成本。

从学位证书来看,作为学术水平的核心凭证,其仅标注专业、学位授予门类、授予时间及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公章,未涉及学位论文这一评估毕业生科研素养的关键信息,这也使得毕业生不得不另外提交学位论文等附带材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才评估的高效性和精准性。

实际上,学历学位的双重验证不仅程序繁琐,还降低了证书本身的权威性。为推进现代大学建设,2014年教育部依托学信网建立全国统一的学籍学历信息备案与查询体系,毕业(学位)证书进入纸质证书+电子注册官方备案并行阶段,所有需要核查学历学位的地方,都要求提交除学历学位证外相应的学信网认证信息,个人及单位均不得花费人力做鉴定核实。高校毕业生在申请学历学位验证报告时也面临多重问题:一是学历学位信息需要本人自行绑定学信网并申请通过后,才可申请学历学位验证报告,有第二学位者要绑定多个证书。如果出现手机号码或者绑定邮箱等信息更换,验证流程则变得更麻烦。二是若遇到院校改名、撤销,在申请验证报告时,需等待学信网更新信息或到教育主管部门开具证明材料,则耗时更久。

防伪性与权威性不足,也使毕业(学位)证造假现象频发。2000年前后,国内存在不少学历造假现象,使得用人单位难以辨别真伪,学信网的建立有效避免了这一现象。然而,部分造假者利用学信网查询机制的漏洞,进行“学历套号”,即找同名同性或信息相近的真实毕业生,克隆其毕业证信息,或伪造山寨学信网等方式进行蒙骗。此外,尽管用人单位可通过学信网辨别验证报告的真假,但实际生活中由于求职者人数众多,逐一验证工作量较大,用人单位往往过分依赖求职者提供的材料,忽视了甄别查验。

优化毕业(学位)证书的建议

优化证书样本设计,扩容相关信息。从全球来看,不少国家尝试将毕业生的成绩与能力直接体现在毕业证上。例如,俄罗斯高校毕业证书按成绩分为红本或蓝本,以颜色来区分成绩是否优异;英国则是按成绩差异,将本科学位划分为5个等级,每一等级直接标注在学位证上。为实现样本扩容,可在现有毕业(学位)证书上增设专属二维码。毕业证书的二维码直接链接“学习质量档案”,包含在校期间的课程平均绩点、在校成绩单、所获奖励等关键信息。个人通过扫码即可直接查看和下载加盖学校公章的相关学历

从学位论文致谢的“缺席者”看大学办学理念

■包万平

学位论文致谢,长久以来被视为学术写作中“不学术”的部分。正因如此,它反而成为判断大学办学水平的“一手资料”。在这里,学生可以暂时放下学术规范的种种约束,以第一人称,带着情感,不加掩饰的方式写下求学岁月中最真实的记忆。每一篇致谢,实际上都是一份办学理念满意度评价报告,它记录了一所大学与其学生之间究竟建立了怎样的关系。

先看出场者。翻开任何一篇真诚的学位论文致谢,最频繁出场的无疑是导师。一位好导师在学生致谢中的形象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有温度的。除了导师,同门师兄、姐妹也常常出场,他们构成了学生生活中最温暖的底色。另外,实验室的管理员、仪器设备的维护人员有时也会出现在致谢中,他们虽然不是教授,却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了学生的成长。甚至图书馆的管理员、食堂的阿姨、宿舍的楼管、校门口的保安等,都可能在致谢中获得出场机会。比如,最近兰州大学一学生在毕业论文致谢中特别提及学校聘请荒老人入校一事。

这些出场者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都以某种方式真正关心过学生,帮助过

学生的温暖过学生。他们的出现折射出大学的育人氛围。因为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和影响。那些能够让学生多年后仍然感念的,往往是某个具体的单位或人在关键时刻带来的温暖。

从教育现象学的视角来看,这些具体的、有温度的“出场”,恰恰印证了教育作为一种“相遇”的本真状态。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学校在某个具体情境下“看见”学生,并以恰当方式“回应”学生需求的能力。所以,大学办学理念的高下就体现在它是否为这种“相遇”创造了积极的条件,是让每一个岗位上的工作人员都拥有教育自觉,还是将他们简化为流程上的一个冷漠节点。

然而,更值得关注的还是那些没有出场的人。在绝大多数的学生学位论文致谢中,有一些本该出现的身影始终缺席。比如,大学的行政管理部门几乎从不出现。很少有学生在致谢中感谢学院的教务办公室、研究生院的流程审批者、帮助办理各种手续的行政人员。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在大多数学生的经历中,与行政系统打交道意味着繁琐的程序、反复的跑腿、无休止的表格填写,

以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规定。学生感受到的不是服务,而是麻烦;不是支持,而是障碍。另外,那些照本宣科、与学生毫无交流的课程教师,几乎从未出现在致谢中。还有那些本应提供支持但却形同虚设的机构,如心理咨询中心、职业发展指导中心等也几乎从不出现。

为什么这些人和机构没有出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许多大学实际奉行的办学理念背后往往存在另一套逻辑。大学的资源配置首先考虑的往往是行政管理及领导需求、安全管理以及科研设备投入与科研产出等因素。这是行政系统最习惯的运行方式,其优先追求的是不出错、可追责、流程规范和绩效产出。在这些优先级的排序中,学生的成长需要与体验大多被放在了后面。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大学在定位自己与学生的关系时运用了工具性思维。学生被理解为大学功能的接受者,而不是大学存在的目的。大学提供课程,学生来上课;大学设置培养方案,学生来修读;大学制定毕业标准,学生来达标。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是被动的接受方,大学很少去问学生真正需要什么、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要解决这一问题,大学需要真正

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大学为什么存在。如果答案是培养人,那么所有的制度设计与资源配置都应当围绕这个目标展开。设计行政流程时应当问,这个流程对学生的体验意味着什么。评价教师时应当问,这位教师在学生成长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决定资源配置的优先级时应当问,这笔投入能否有效促进学生的成长。

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回答,需要的是办学理念的整体转向。学生才是大学的根本,因此,一所真正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就应当定期对每一项工作进行学生体验“审计”,排查工作是不是落实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反思大学治理的权力结构,让学生真正参与到制度设计、流程优化和质量评价各个环节中。只有当学生的声音被听见并转化为实际的制度改进时,那些在学位论文致谢中长期缺席的身影,才有可能在未来获得被学生铭记的机会,大学也才能真正成为学生愿意用文字去感谢、用记忆去珍藏的地方。

(作者系青海省人民政府-北京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教授)